

# 为什么青海湖,为什么南加

■ 冯永锋

## 初见南加

似乎是在2008年的一个冬天,我在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主持的“环境记者沙龙”上,看到一个来自青海湖的藏族小伙子。他急切的心态和不标准的普通话让他讲述的事多少有些含糊,所幸我在西藏工作共三年,凭借对藏族人的熟悉我听懂了大意。

他来自青海湖边,他想告诉大家青海湖虽然禁渔严厉,但每年都有人去偷捕,甚至有一种人,被称为“鱼狼”,专门雇佣人到湖面上捕鱼。捕的主要是青海湟鱼,也被称为青海湖裸鲤。这种鱼生长很缓慢,但吃的人一炖就是好几斤。越不让捕,越有人想吃,越有人逞能去捕捉、逞能去购买。一切难得之物都可能成为一些人的向往之物,无可例外地,这样的命运也压迫到了青海湖生态系统的身上。

当地人也有反对捕鱼的,但反对的人有时候甚至会被“鱼狼”组织的地痞流氓殴打,有位藏族老村长就被打伤了。南加想告诉在场的环保记者们,青海湖生态保护遭遇到了些困境,需要大家帮助。他还拿出了一些照片,希望大家看后会涌起去调查报道的冲动。

可惜当时在场的记者们并没有几个回应,大家都有很多其他看似更重要的活儿。北京的民间环保组织也一时无法感应到青海湖的困境,因此没做出什么反应。

我也虽然一直有心,但却没有腾出足够的精力。

2009年,一个偶然的契机结识了葛玉修,并请他来给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做了一场青海湖生态保护的讲座。葛老师是青海银监局的纪委书记,从1994年起就在拍摄青海湖的鸟类,后来“不小心”拍摄到了中国第一张近距离的普氏原羚“写真”。从此,他把很多的精力用在了普氏原羚的保护上。他甚至想给普氏原羚改名字,改为中华对角羚。

2009年12月份,我又到西宁时,跟随他去青海湖边,那一次,在葛老师的帮助下,我第一次观察到了普氏原羚。当时,正处在普氏原羚的求偶期,一只雄性普氏原羚成功地让将近20只雌性普氏原羚组织成了它的“妻妾阵容”。而那些不够聪明、不够漂亮、不够强壮的普氏原羚,则丧失了所有繁殖后代的机会,它们孤单的身影在冬日的荒原上颇为寂寥。

其实已经没有荒原。脚下的土地几乎都处在被人开发利用



南加的儿子与他救助的一只小原羚成了好朋友

的状态下,我们人类可能是世界上最不知道退让的群体,所有的荒野都会被人类费尽心思地开发利用殆尽。但青海湖边的原野由于草原本身的阔大起伏,又是在冬日斜阳的浅晖下,多少还有一点残余的荒原的意味。

## 再见南加

和葛玉修探讨普氏原羚的保护之道时,很偶然地提起了青海湖边有个叫南加的牧民救助了很多只普氏原羚,还收养了一只小的普氏原羚,和他的儿子一起长大。葛玉修翻出照片让我看时,我一眼认出,他就是一年前“环境记者沙龙”上我见过的那个藏族小伙子。

2010年,北京另外一家致力于环保的NGO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”,在青海湖边开展“乡村之眼”项目,给当地的牧民一台相机或者一台摄像机,让他们拍摄自己眼中的自然与生态。南加也成了“乡村之眼”的成员之一。

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主任是北大教授吕植,她同时组织了一批科研力量去研究普氏原羚遭遇的生存困境。普氏原羚过去数量在万只以上,后来由于长时间遭遇捕杀,目前只剩下1000只左右。所有稍微了解物种保护的人都知道,一个物种如果其野外数量只剩下1000只左右,那么离灭绝和消亡就不远了。

我又顺便了解了一下普氏原羚的其他背景,普氏原羚现在只生活在青海湖边的沙地和草

原上,1000只并不集体生活在一起,而是大概分为了7个左右的小群,分散在青海湖边的几个县。青海湖过去是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2007年之后,由于青海看到了青海湖的旅游开发前景,专门成立了“青海湖景区保护与利用管理局”,把保护区收编进了这个局之后,成为其二级部门。

即使不为了利用,青海湖周



南加很重要的工作之一,就是清理青海湖边的垃圾

边草原也早已被铁网围栏分割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中国所有有草原的地方,都在推广“草畜双承包”,也就是在过去牲畜承包的基础上,把草原也承包给各家各户。这有点模仿农区的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,为了区分开承包到的草原,牧民家家户户都给自家的草原围上了铁丝网制作的“网围栏”,它大概有一米多高,每根铁丝上面都有铁刺,以防止牛羊撞击。

人类把草场全部分割为己有的时候,草场上过去生活的野生动物就丧失了自由来往的可能性,鸟类和昆虫可能还好些,大不了可起飞或者贴地行走,而像普氏原羚这样必须在草原上奔跑、依靠青草生存的“有蹄类”动物,就很难逃脱“栖息地人类化”之后生存环境恶化、威胁到生命的必然命运,甚至有怀孕的普氏原羚跳不过围栏而被卡在满是铁丝的围栏上。

## 南加的行动

南加早年是一个商人,再往前追溯,他是青海湖湖东种羊场的一名工人。他一直生活在青海湖边,湖东种羊场成立后,把周边的一些“村庄”或者说草原征为公用,南加就这样随草原进入湖东种羊场。湖东种羊场倒闭之后,这些过去被征用的土地和村民又重新获得了自由,重新成了“村庄”。

南加分到了草原之后,看到了鸟类、鱼类、普氏原羚遭遇的种种危险,也发现了草原在人类的重压之下持续退化的悲惨之状。

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行动起来,要想让其他人信任自己的做法,唯一的办法是先做给人家看。

站在他家门前,看着青海省林业厅出资200万元给建设的“普氏原羚救助基地”,感觉到有些好笑又感觉到很有希望。按照这个救助站的规模,少说也可以救助几十只受伤的普氏原羚。可南加关注普氏原羚十多年来,也不过才救助11只。但这么多的房子当然是有用的,如果在救助普氏原羚的同时,把这个地方慢慢地建设成一个公众环境交流基地,那么所有的硬件设施都会被激活,南加也将从一个自发的环境保护者,慢慢地成为一个环境保护的引领者。他会从一个人,变成一群人。

## “一个人”到“一群人”

环境保护的基本状态是就地保护,是当地人的保护。生活在当地的人如果丧失了保护当地自然的权利,那么环境一定会遭遇最严重的糟蹋。只有在极少数的地方还有当地人保护当地环境的可能性,我不知道哪里会是这样的地方,但我知道有一些地方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地方,还有南加这样的人在行动。

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加重,如果把责任全部委托给更多的“南加”,显然是不公平的,也是危险的。每次我见到南加,都建议他要加强团队建设,让他年轻的女儿,让他邻居中年轻的血液,一起参与到这个持续而庞大的事业中来。同样,我也很清楚,环保组织也肩负着使命,通过对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件的分别担当,可以让环境保护的可能性变得最大,也持续得最久。

于是不仅仅有了南加的普氏原羚公众教育基地的建设,也有了“普氏原羚生态假期”的活动推广。按照这些活动的设计理想,青海湖边不仅仅会出现一大批保护当地环境的本地人士,而且会出现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“环保志愿者”。他们的出现将给普氏原羚的保护带来原先诸多的不可能——比如,网围栏将有可能降低或者被拆除;更多的牧民将控制牛羊的数量,而避免再让草原退化为沙地;喜欢乱扔垃圾的游客将因为羞耻心而将伸到车窗外的手缩回;而举着相机追逐野生动物的人将知道以敬畏之心、尊重之心去拍摄眼前的自然。

也许,借助南加这么一个支点,普氏原羚的种群将有可能得到恢复。

(作者系《光明日报》记者)

